

步濟時及其《北京的行會》研究

——美國早期漢學的轉型

Burgess and *The Guilds of Peking*: The Transition in Early American Sinology

趙曉陽 (Zhao Xiaoyang) *

最早將社會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方法帶到中國的是美國人步濟時 (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他的《北京的行會》(*The Guilds of Peking*)¹是中國行會研究的集大成者。²它是第一本運用現代社會學理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通過田野社會調查方法研究中國行會的外文書籍。本文將就其人其作以及在美國漢學中所表現出來的轉型性意義做一些探討。

—

步濟時出生於美國一個城市平民家庭，父親是基督教長老會的長老，基督教男青年會的積極分子，紐約州監獄改革的倡議者。他在普林斯頓大學讀書時，是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for Foreign Mission)的積極參與者。1905年畢業於普林斯頓大學社會學系後，曾在奧伯林神學院和紐約協和神學院短期學習。很快他到了日本，在京都教授英語並為基督教青年會工作。1905年，他與在日本傳教的Henry Day Fisher的女兒Stella Fisher (1881-1974)結婚，與基督教會的關係因此更加密切起來。³1907年到哥倫比亞大學學習，1909年獲得碩士學位。

這時的步濟時受到基督教會「喚醒中國青年的挑戰」的吸引，於1909年來到北京，任北京基督教青年會幹事。1911年他組建了隸屬青年會學校部的北京社會實進會(Student Social Service Club)，後來發展到有600名學生參加。這一組織主要在北京社會開展社會慈善性、救濟性活動，開辦貧民夜學、演說、調查及孩童遊戲諸工作。1914年，得政府正式立案。⁴他還把進行社會調查、從事社會研究列入自己和社會實進會的工作計畫。⁵最重要的是，他在青年會的活動中與北京眾多學生有了接觸，試圖將學生們改革社會的熱情與基督教的社會服務性工作結合起來。

1919年，在北京的中外基督徒組織了北京證道團，他們認為「深知基督教是改良中國社會唯一的需要」，「又深知道在現今的時候，傳佈基督教又必得接近今科學、哲學的概念，解除現代人種種的誤會及疑惑。」⁶中國人有李榮芳、梅貽琪、丁淑靜、吳耀宗、李天祿、徐寶謙，外國人有司徒雷登(J. L. Stuart)、步濟時、博晨光(L. C. Porter)、蘇爾慈(P. A. Swartz)、柴約翰(J. L. Childs)等，都是在燕京大學或男女青年會工作的人。還於1919年10月創辦了一本基督教思想與實踐的刊物《生命月刊》，⁷步濟時是主要撰稿人之一。

* 作者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副研究員。

1 《北京的行會》已由趙曉陽翻譯，即將出版。

2 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1。

3 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大學人物志，步濟時》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8。

4 徐寶謙，〈北京社會實進會〉，《中華基督教會年鑑》(上海：中華續行委辦會，1916年)，委九十四。

5 Shirley Garrett, *Social Reformers in Urban China, the Chinese Y.M.C.A., 1895-1926*,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33-136.

6 王毓華，《北京基督教史簡編》(北京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辦公室，北京市基督教教務委員會辦公室出版)，頁149。

1926年《生命》與《真理》月刊合併，改名為《真理與生命》，成為基督教三大權威刊物之一。⁸

通過基督教團契北京證道團，他和燕京大學建立了聯繫，⁹1919年開始在燕京大學宗教學院教授社會學。1922年，為了給美國在中國設立的社會團體及社會福利培養社會服務工作人員，美國普林斯頓——北京基金會（後改為普林斯頓——燕京基金會）派他在燕京大學倡議成立了社會學系。步濟時任系主任，6名教師均係美國人，這是我國成立最早的社會學系之一。¹⁰當時分為理論社會學和應用社會學兩個科，以美國教材為主，主要講授宗教學、社會服務工作、社會調查等。1924年

聘請中國教師許仕廉、陶孟和、李景漢等，他們分別講授「社會學原理」、「社會調查與研究方法」等課，男女青年會、盲童學校、醫院、慈善機構等是學生實習場所。1925年，社會學系改稱「社會學與社會服務學系」，課程由十幾門增加到三十多門，增加的主要是有關社會學理論和社會調查等方面的課。

社會學是一門中國「本無」的學科，1908年聖約翰大學創設社會學課程，由美國人亞塞·孟（Arthur Moon）講授，1913年上海滬江大學也開設社會學課程，1915年由美國人葛學溥（Daniel Harrison Kulp, 1888-?）創立社會學系，1917年清華學校（後來的清華大學）設立由美國人狄德莫（C. G. Dittmer）講授的社會學課程。除教會學校外，國立的京師法政學堂於1906年和京師大學堂於1910也開設了社會學課。

步濟時首先將社會學研究中的田野調查帶到了中國，1918年前後，他與普林斯頓同學甘博（Sidney David Gamble, 1890-1968）合作，運用田野調查方法對北京社會狀況進行了包括歷史、地理、人口、政治、衛生、教育、經濟、生活、社會問題等廣泛深入的調查，於1921年在美国出版了《北京社會調查》（*Peking: A Social Survey*），這是高等學校城市社會調查的開始。¹¹

1928年，他又在田野調查的基礎上撰寫出版了這本關於北京行會的書，這些都成為中國社會學調查中值得一提的里程碑事件。

1926年，因孩子的健康問題，步濟時帶全家回到美國，1928年獲得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博士學位。1928至1929年他又回到燕京一年。1930至1933年，他在Pomona College教書，然後到費城的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任社會學系主任和教授，直到1948年退休。他開設了婚姻和家庭和宗教社會學課程。他於1938-1943年還主持了威爾斯利學院的社會進步專案，幫助建立了費城成人教育協會和費城不同種族基督教青年會。他還是美國民主行動（American for Democratic Action）的成員，他的夫人也是費城的一名社會工作者，將他們的成人教育和種族問題的努力作為燕京動力的繼續。¹²1949年，步濟時逝世於美國。

二

行會是商人和手工業者帶有社會性和互助性職能的組織，其形式中外皆有。中國的行會究竟始於何時，見解不一。一些散見的史料表明，遲至8世紀末，唐代已有行會組織的雛形存在。宋朝以後，隨著工商業的逐漸發展，行會組織的規模日益壯大。明代嘉靖、萬曆年間，北京就有由外省商人興建的名為會館的建築物出現，這表明商業各行對內對外事務已日益複雜。

行會雖然是中國從古至今都存在的一種經濟組織形式，但在傳統重農抑商社會中，關於它的中文資料和研究卻非常少。其考察研究已有百餘年的歷史，但最早進行的卻是外國傳教士和學者。首先是美國浸禮會傳教士瑪高溫（Daniel Jerome MacGowan, 1814-1893）於1883年和1886發表的《中國的行會及其行規》（*Chinese Guilds and Their Rules*）¹³和《中國的行會》（*Chinese Guilds or*

8 徐以驊，《教會大學與神學教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9年），頁100。

9 燕京大學校友校史編寫委員會編，《燕京大學史稿，1919-1952》（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1999年），頁1112。

10 董天民，〈燕大社會學系簡史〉，《燕大文史資料》第8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4月），頁65。

11 韓明謨，〈中國社會學調查研究方法和方法論發展的三個里程碑〉，《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4期。

12 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大學人物志·步濟時》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9。

13 原文載《中國評論》（*China Review*），vol. XII, 1883；中譯文見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頁51-57。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rades Unions)¹⁴ 兩篇文章，
《中國的行會及其行規》嚴格說來還稱不上是真正的論著，除簡短的前言外，主要是輯錄了有關行會的行規；
《中國的行會》將當時的中國行會分作商會（*Chambers of Commerce*）和工會（*Trades Unions*），即商人行會和手工業者行會。馮高濂通過實地考察，不僅簡略介紹了寧波、溫州兩地工商行會的基本情況，還涉及有關行會的源、行會內部的管理、功能與作用、行會與政府的關係、行會與外商的關係，這些在行會研究領域具有開拓性作用。

美國人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出版了《中國行會考》（*The Guilds of China: with an Account of the Guild Merchant or Co-hong of Canton*），¹⁵ 該書將中國行會分為手工業行會、商人會館和商人行會三個部分加以考察，其中關於手工業行會的論述較為詳細，包括手工業行會的起源、成員、與政府的關係、收入來源、行業崇拜等多方面。

步濟時的《北京的行會》1928年由紐約AMS Press公司出版，是對北京42個行會的成員、組織、集會、財務、功能進行田野社會調查的基礎上，全面地介紹論述了行會的起源、歷史、經濟、慈善和宗教活動以及未來趨勢，全書共270頁、14章，即研究的方法和範圍；行會的起源和歷史；北京3個行會的描述性研究；行會的數量、行會會所和行會事務所；行會成員；行會組織；行會會議；行會經濟；學徒制度；行會的慈善事業；行會的宗教活動；行會的作用；行會的現代趨勢和未來；問題和可能性；附錄2個，即行會問卷和一些行會的歷史資料；表格19個。全書既有綜合性的論述，也有具體的個案考察，以中西方行會的比較研究見長。本書還大量引用介紹了當時中國社會經濟轉型過程中對社會經濟社會的研究著作，尤其集中了學術界、基督教界對此的關注。

許多年來，中國學者只有30年代出版的全漢昇的

《中國行會制度史》（上海：新生命書局，1934年）。50年代開展有關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討論以來，行會問題才逐漸引起人們的關注。但早在20年代，作為一名基督徒和社會學家的步濟時，將傳統中國人所看不的中國人的歷史從地上拾起來，用當時中國人幾乎是完全不知的現代科學觀點加以分析觀察，儘量還其本來面目，探討作為古老中國的基本社會組織存在千年的原因，而如今是如何在現代條件下逐漸消失、以及恰當適時地轉變為新型大工業條件下的新型工業和社會組織的可能性。

步濟時希望通過古老中國的社會組織的瞭解和研究，得到古老國家發生得如此之快的巨大改革的一些尺度，一些基礎性理解。希望這次初步調查能引發進一步的研究，而進一步研究最好是由受過特殊研究培訓的中國人開展。¹⁶ 在北京多年的社會調查和研究後，他認為西方的社會學在觀念和結論真是太狹隘了。早在1917年他就說：「涉及到早期社會調查領域，大部分社會學著作在結論上都忽視了至少一半人類。」¹⁷ 歷史為這位西方學者提供了認識東方社會的機會，他並沒有一葉障目地想當然地認為，將西方社會對東方的認識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而是在科學的田野調查研究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認識和觀念，將西方傳統社會學視野之外的東方社會納入到自己的視野之內。他對中國社會組織的認識理解給我們帶來了認識自身的角度和契機，通過西方人對中國、北京的認識這面歷史的「西洋鏡」，我們可以從中感受和領略中國本土意識之外的人們對自己的看法。在整個中國社會、歷史文化處於變革、修正的歷史大時代，尋找如何更好地接受並改變古代思想習慣和社會組織形式，作為中國社會經濟組織網絡連結點，行會具有的重要意義，這也正是本書的價值所在。

本書已由申鎮均翻譯為日文，牧野巽校閱，1942年由日本生活社刊印，書名《北京のギルト生活》。

14 原文載《亞洲文會雜誌》（*Journal of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vol. 21, no. 3, 1886，中譯文見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頁2-51。

15 《中國行會考》初版於1909年，1932年再版。主要內容的中譯文見彭澤益主編，《中國工商行會史料集》上冊，頁57-90。

16 步濟時，《北京的行會》前言。

17 燕京研究院編，《燕京大學人物志·步濟時》第1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178。

三

美國漢學雖然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很快。如果從源流上考察，美國現代中國學可以說是在反歐洲傳統「漢學」的境況下誕生的。¹⁸所謂歐洲傳統「漢學」對中國的認識主要源於來華傳教士的各種報告、著述、書簡中描述出來的一幅中華帝國的歷史圖景，他們對中國歷史進行了帶有迷幻讚美色彩的「想像式建構」。¹⁹

美國漢學最早只能追溯到 19 世紀中葉。1829 年美國傳教士隨著美國首批來華商船在廣州登陸，從這些來華傳教士中培養出來了美國最早的漢學家，如裨治文（Elijah C. Bridgman, 1801-1861）、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丁韞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等。

1842 年美國傳教士和外交官正式成立了美國東方學會，比美國歷史學會成立的日期還早。1848 年出版的衛三畏的《中國總論》（*The Middle Kingdom*），標誌著美國漢學研究的開始。1851 年陸續出版了《美國東方學雜誌》、《美國東方叢刊》和《美國東方學翻譯叢刊》。美國東方學會目的是為了健全組織體系，加強研究隊伍，有系統地進行東方學的研究，最早的會員就是裨治文、顧盛（Caleb Cushing）等來華傳教士和外交官，但美國東方學會從一開始就有一種與眾不同的使命感。²⁰

美國早期漢學研究主要由非職業化的傳教士、外交官和商人承擔，仍然遵循歐洲漢學研究的傳統，其著作一般偏重於對中華歷史文化的研究，這些研究有助於西方世界瞭解中國的傳統文明。研究出於中美雙邊關係以及研究者本人的職業和興趣的需要，在對中國歷史進行

總體研究的同時，更加突出對中國政治史、法制史和外交史的研究。他們是沒有受過訓練的非職業研究人員，研究的目的是為了更加瞭解中國，而達到其外交和傳教的目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在華勢力下降，美國大力擴張在中國的勢力。由於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需要，美國漢學從歐洲古典模式向現代轉型，把研究的關注點對準了中國的近現代問題，漢學研究變成了美國全球化總體戰略支配下的「區域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帶有相當強烈的對策性和政治意識形態色彩。

出於國際形勢和美國對策略的需要，美國政府和美國企業集團都日益重視對中國的研究，並給了研究中國問題的機構以支援和贊助，一系列的漢學研究機構的成立，²¹都標誌著美國漢學研究的專業化和科學化。尤為重要的是逐步形成了一支科學的、專業化的研究隊伍，他們所從事的微觀漢學研究在學術上取得了重要的成果，而學生海外傳教運動則為美國早期漢學研究的轉型：從傳統走向現代，奠定了人員基礎。

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是美國基督教會於 19 世紀 80 年代形成的振興高等教育人員的宗教精神和安排他們到國外傳教的運動，它將傳教範圍從美國國內擴大到國外，傳教人員從基督教內部擴大到基督教以外。²²傳教成員不僅是受過神學訓練的傳教士，更多的是受過高等專業技術訓練的大學生。²³從美國對中國的認識和研究來說，它促使了由傳教士、外交官為主的非職業化的美國早期漢學隊伍向由科學化、專業化的職業漢學家的轉型，為這種轉型提供了不但從專業上受過訓練，而且對中國有具體生活工作經歷的專業人員，使美國對中國的研究在二次世界大戰後發展迅速，終領世界漢學之前列。

18 周勤，〈本土經驗的全球意義——為《世界漢學》創刊訪杜維明教授〉，《世界漢學》創刊號，頁 9。

19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New York, 1983), pp.1-9.

20 費正清，〈70 年代的任務：研究美國與東亞的關係〉，《費正清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 年）。

21 如 1911 年建立的紐約卡內基基金會，1913 年建立的洛克菲勒基金會，1936 年建立的福特基金會，都曾大力資助過中國研究。1925 年成立了美國太平洋學會，1928 年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1927 年建立美國國會圖書館中國部。

22 Paul A.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s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55.

23 1886 年至 1936 年的學生志願傳教運動中，有 5 萬名大學生參加，其中 1 萬 3 千人到國外傳教，佔美國全部海外傳教士數目的一半。1886 至 1918 年，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派往外國的傳教士達 8140 人，其中三分之一，即 2524 人被派到中國。

步濟時就是參加學生志願海外傳教運動而來到中國的，他的研究從另一個角度驗證了這個現象。我們還可以舉出幾位 1906 年至 1923 年由學生海外傳教運動派到中國的最早的專業中國研究專家，如賴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1910 年以浸禮會教士來華，1910-1917 年任長沙雅禮學校老師，後任耶魯大學教授。他側重於基督教史的研究，開拓了新的研究領域，著述甚多，學術成就使他 1948 年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宓亨利（Harley Farnsworth MacNair, 1891-1947）1912 年來華，任聖約翰大學歷史學和政治學系教授，並為《密勒氏評論報》的特約編輯。1926 年任華盛頓州立大學、芝加哥大學教授，是美國研究中國外交屈指可數的人物之一。卜凱（John Lossing Buck, 1890-1962）於 1915 年來華，任金陵大學農學系教授，他的中國農業研究無人能及。葛學溥 1913 年以浸禮會傳教士來華，1915 年在上海滬江大學創立社會學系並任教授。

1918-1919 年指導學生在廣東潮州市潮安縣歸湖鎮調查有 650 人的鳳凰村，並據調查著有《華南鄉村生活：家庭主義的社會學，廣東潮安鳳凰村》第一卷（*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 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 Vol 1, Phenix Village, Kwangtung, China*），是高等學校鄉村社會調查的先驅，至今仍是華南地區鄉村生活的代表作。恒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l, 1884-1975）1915 年以公理會教士來華，1924 年任北京華北協和華語學校中國史教師，1927 年任美國國會圖書館亞洲部主任。他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1644-1912）》（*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 1644-1912*）被費正清認為是研究現代中國早期的一個重要里程碑。

國內學界對海外漢學的研究向來重視歐洲漢學和美國當代漢學，對美國早期漢學和 20 世紀初期轉型期奠定當代漢學基礎的研究和介紹都有所不足，拙文對此做了一些探討，希望能引出更多學者的關注。

《漢學研究》中止稿費給付啟事

- 一、《漢學研究》（半年刊）自 2003 年 6 月（第 21 卷第 1 期）起，中止施行多年的支付稿費成例。
- 二、漢學研究中心預算經費逐年緊縮，因此《漢學研究》近期內不得不擲節開支；另一方面有些學者建議，《漢學研究》是提供海內外學者發表高水準研究心得的園地，應依循國際學術期刊的通例，不宜以支付稿費方式酬謝作者，以維護學術尊嚴。《漢學研究》編輯部衡酌上述困難與建言，經召開編輯委員會討論，決定自 2003 年起取消以往致奉稿費作法。
- 三、為答謝作者惠賜稿件及對《漢學研究》的支持，凡來稿經錄用刊載，即酌贈漢學研究中心出版品，由作者自行選擇，論著稿件以書刊定價金額新臺幣 5,000 元為度，書評稿件以新臺幣 2,000 元為度。另當期紙本刊物 2 冊、抽印本 50 份仍照舊致送。
- 四、以上敬請作者見諒，並請繼續惠賜稿件和支持指教為禱。

漢學研究中心 《漢學研究》編輯部 敬啟